

地標、記憶與家國

——宋王臺的文學書寫(1911—1960)

王 娟

提 要

香港九龍地區的宋王臺是南宋末年帝昀、帝昺曾經駐蹕的地方。以前清翰林陳伯陶為代表的遺民于民國前後避居香港，對宋王臺進行考證、書寫，將其打造成在港遺民懷念故國的象徵性地標。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裏，居港文人接受並傳承先人的記憶，圍繞宋王臺進行書寫，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戰爭期間為拯救民族危亡而發揚民族團結精神，文學成為凝聚民族團結的力量。戰後發懷古之幽思和動亂之感，文人們對家國的熱愛始終如一。其中，居港遺民關於宋王臺的唱和詩詞體現出群體意識，包括首唱者的領袖意識、群體成員的從服意識、唱和諸人的主動參與意識以及傳播、彰顯本群體的意識。“臺”承載著歷史記憶，詩題“宋王臺”與典故“西臺”的使用均體現出文化傳承。宋王臺承載了幾代人的家國情懷，文人通過對宋王臺的書寫構建起飽含文化記憶和自我經驗的心靈世界。

關鍵詞：香港 宋王臺 群體意識 家國 文化記憶

地標指某個地方具有獨特地理特色的建築物或者自然物，往往能夠被賦予特定的人文意涵，因此特別容易引起文人的注意，並對其進行書寫。不管是自然的地標，還是人文的地標，一旦經由文人書寫，也就體現出特定的歷史文

化意義。另外，對地標的文學書寫往往具有現場感，不僅可以對文學史的場景進行還原，還可以具體感知文人的心靈，是心靈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標大多承載著獨特的文化記憶。民國初年流亡香港的清遺民群體之詩歌唱和多圍繞九龍城的宋季古跡宋王臺展開，甚至將與之相關的侯王古廟一併納入寫作視野，共同打造成遺民懷念故國的象徵性地標，藉以表達深深的亡國之痛。

一直以來，香港文壇關於宋王臺¹的書寫深入而廣泛，從文體看，涵蓋了敘事、說理之文和抒情言志之詩詞歌賦；從時代看，從民國初年一直延續至今（限於篇幅，本文論述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從情感上看，眷念家國是始終如一的主旋律。而在關於宋王臺、侯王廟的多種體裁作品裏，既有堅實的考證，也有文人的想象；在這片遺跡上，既有群體的雅集，也有個人的流連。圍繞宋王臺而出現的文化活動中，詩詞唱和是突出的現象，文人們通過對宋王臺的書寫，構建起飽含文化記憶和自我經驗的心靈世界，體現出文化的連續性和恒久性。

關於宋王臺與香港文學文化的關係，前人已經做了一定的研究，如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但高氏的研究主要是談殖民地中想象，以及重申遺民空間和民初香港的離散詩學，與本文雖有聯繫，但關注的焦點並不相同。本文擬從遺民選擇宋王臺為地標的心理動機、吟詠詩詞的文化內涵、文人群體意識的展示、典故的使用與家國情懷、由個體到傳承到形成文化記憶等角度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地標的選擇及其心理動機

辛亥革命後，一些身負前清科舉之名的文人對遜清宗室懷抱忠誠，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對待新的民國政權。其中一部分文人選擇避地香港，做文化遺民，較著者有吳道鎔、陳伯陶、黃映奎、蘇澤東、梁涓、丁仁長、汪兆鏞、張學華、何藻

1 宋王臺和侯王古廟的關係非常密切，文人對宋王臺的歌詠往往會涉及侯王古廟，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以宋王臺加以代表，以下不再具體說明。

翔、賴際熙、江孔殷等。就身分而言，有聲名卓著的前清探花陳伯陶和翰林院庶吉士賴際熙、丁仁長等；就籍貫而言，主要集中在廣東，如東莞（陳伯陶、蘇澤東等），番禺（吳道鎔、張學華、丁仁長、汪兆鏞等），增城（賴際熙等），香山（黃映奎等）。

香港對遺民們來說是較優的選擇。一方面，雖然清朝帝制被中華民國取代，但是已成爲英國租界的香港未受影響，成爲化外之民仍可保持精神的自由，守清朝舊俗，還可開展保存地方文獻、發展教育事業、搜求歷代遺民作品等活動。正如張學華《瓜廬詩賸·序》中所說：“辛亥以還，桑海既易，管寧避地，焦先結廬，棲遲寂寞之鄉，問詢漁樵之侶。”² 稱讚陳伯陶像隱士管寧和焦先那樣避居不仕，來到偏遠的香港隱居。

另一方面，香港長期以來作爲中國領土有很多中華文化的遺存。遺民們可以在這裏找到一些寄託之物表達故國之思。這可能是一些舊物，如清代朝服，抑或偶然拾得的宋行宮片瓦；也可能是一些歷史遺跡，如宋王臺、侯王廟等。其中，遺民們對宋王臺投入了較多的情感。因爲這是南宋末年帝王在香港九龍留下的遺跡，象徵著正統，容易激起文人雅士的“板蕩之悲”、“黍離之感”。³

值得進一步提出的是，他們不僅把遺跡看做一種客觀存在，而且親身參與其歷史建構。可以說，宋王臺作爲地標的確立，是他們參與建構的結果。

陳伯陶在居港遺民中有較高的地位和聲譽。遷居九龍後，他“登眺之暇，因爲考證諸書”，對宋王臺作了詳細的考證，指出：“其地（官富場，今九龍）東南有小山，瀕海上，有巨石，刻曰‘宋王臺’”，認爲這裏便是宋末皇帝建立行宮的地方。他還質疑歷史記載，提出自己的兩點看法：其一，宋王臺是帝昞，而不是帝昺建立行宮的地方，“逮至元十五年四月，端宗崩於碭州（自注：即今大嶼山），帝昺立。六月遷崖山，不再至茲地。然則臺乃端宗駐蹕之所，非帝昺也”。其二，宋王臺實爲宋皇臺，“石刻舊稱宋王，以史稱二王而然，茲正之曰宋皇”。⁴

2 張學華：《瓜廬詩賸序》，《閩齋稿》（廣州：蔚興印刷廠，1948年），頁16。

3 參見羅濂：《游九龍宋王臺文》，程中山：《香港文學大系舊體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263。

4 陳伯陶：《宋皇臺懷古并序》，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卷中頁1下一頁2上。

正名之後，陳伯陶時常邀約同道之人共訪。李景康在《紀賴際熙等保全宋皇臺遺址》一文中回憶到：“民國元年，增城賴煥文太史任教于香港大學。同時，東莞陳子厲太史僑寓九龍城瓜廬。兩先生交誼素篤。煥文先生有暇，輒渡海過訪於瓜廬。其時予肄業大學文科，間或隨行。清談片刻，相與踟躕宋臺遺址。兩先生徘徊瞻顧之餘，輒興異代相感之思。”⁵ 賴際熙住在已經割讓給英國的港島，陳伯陶住在當時租借給英國的九龍，他們共同對宋王臺產生濃厚的興趣，賴氏還專門渡海而來，說明背後有著非常深刻的心理動機。宋王臺的歷史建構基本上是由這班遺民共同完成的。

除了考證宋王臺的由來，陳伯陶也關注這一歷史遺跡的留存狀況，1915年他作《九龍宋王臺麓新築石垣記》，記敘港紳李瑞琴對宋王臺進行修繕一事，感慨當日“必成一都會”的宋王臺“乃至今日，而荒煙蔓草，樵童溪叟，踣躅於其間。漠然惟見海潮之澎湃，與厓石之巘岈，蓋相去已七百七十餘年矣。微石刻，又孰知為景炎之遺蹟乎？”⁶ 他提出的“都會”想象，以及對於這個“都會”傾頹乃至僅存遺跡的再三致意，是感情性的，也是歷史性的。

那麼，當日宋王臺是什麼樣的呢？陳伯陶展開了豐富的想象。他說：“蓋尚有可為者，則斯臺也。吾意宋之君臣，擁旌北望，必謂有呼渡河與抵黃龍痛飲者焉。而又規形勢，繕宮室，千乘萬騎，散居雞穀間。其艤艚之輻湊，衢路之填委，優傳之交午，饜道之絡繹，櫛比鱗萃。”⁷ 陳伯陶在敘述了宋末二帝逃亡路線和大臣們奮勇抵抗元軍的情形之後分析，當年的宋王臺一帶是南宋君臣最後的希望所在。宋代最後的帝王既然落腳於此，當然希望重振基業，所以陳伯陶想象其行宮之豪華，經濟之繁盛，人煙之輳積，雖然不一定是現實的存在，但是卻是這些遺民們心靈的存在。

陳伯陶還對宋王臺周邊也做了考訂，特別提出：“臺之西北，有楊侯王廟，相傳為宋末忠臣，不知名。余考之史，知即為楊太妃弟亮節。”⁸ 他還在《楊侯

5 李景康：《紀賴際熙等保全宋皇臺遺址》，《李景康先生詩文集》（香港：永德印務，1963年），頁12。

6 陳伯陶：《瓜廬文贖》卷二（香港：自刊鉛印本，1931年），頁41下。

7 同上，頁41上一頁41下。

8 同上，頁42上。

王廟迎神送神曲》詩序中更加詳細地論證了九龍城的侯王古廟是為宋末忠臣楊亮節而建。自是而後，宋王臺、侯王廟，再加上二王殿村、金夫人墓等，就成為遺民心中的宋季古跡，成為清朝遺老懷念故國的象徵性地標，當然也成為此後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記憶，“懷古之士，俯仰憑吊，稍稍見之吟詠”。⁹

陳伯陶之所以在嚴謹的考據之中又包含了文人的想象，與香港的地理文化特質和他自己的身分以及心理動機密切相關。香港被視為天朝棄地，又被外國人佔領、統治，這種特殊的地理文化特質和政治環境使得遺民們對香港有一種異常的感情，然而既然立意在此終老，就得找到心靈的寄託，宋王臺正可以擔當這種功能。

二、宋王臺詩詞唱和的時代特徵與文化內涵

宋王臺得到修繕前後，遺民們在此展開了一系列聚會和詩詞雅集活動。儒商陳步墀尊奉陳伯陶為師，曾將雅集照片、書法、繪畫、詩詞等編為《宋臺集》。其中有四張照片，分別是：1. 陳步墀等七位文人站立在山頂宋王臺大石處；2. 陳步墀等四人就座於山上的涼亭；3. 陳伯陶、賴際熙、陳步墀、張學華等八人站立於暢齋室前；4. 陳伯陶、賴際熙、張學華等六人聚於聖山腳下的池塘旁。¹⁰ 這或者只是他們頻繁的社集活動中留下影像的四次，但也可見此地對他們的吸引力。自此以後，居港文人常聚于此、進行雅集，幾十年間，產生了大量的唱和詩詞作品。

（一）民國初年：遺民情懷與家國之感

民國初年是宋王臺唱和活動的高峰，此時，不少清遺民來到香港，面對前代一個正統王朝留下的遺跡，當然是心靈複雜，充滿感慨。

9 吳道鎔：《宋臺秋唱序》，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序頁1上。

10 詳見陳步墀《宋臺集》，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

在一系列考證文章之外，陳伯陶還寫了不少詩，如《宋皇臺懷古》、《宋行宮遺瓦歌》、《宋皇臺之北有楊太妃女晉國公主墓》、《楊侯王廟迎神送神曲》等，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系列，似乎也是在印證他之前的考證。《宋皇臺懷古》中回首南宋滅亡的經過，再現了宋末二帝逃難南方海上的情景，以及忠臣義士的英勇行爲，又進一步寫“皋羽所南足跡絕，遺黎老死云誰吁。君不見臨安宮禁啼鷓鴣，蘭亭坯土冬青枯”，¹¹于南宋遺民謝翱心有戚戚。

陳伯陶的這些思念故土、心憂故國之作廣泛流傳於遺老詩友間，在九龍居港遺民間掀起了現場詩詞唱和的高潮。1916年農曆9月17日，他以祭祀廣東東莞著名的南宋遺民趙秋曉爲名，邀約賴際熙、蘇澤東、張學華、何鼎元、汪兆鏞、伍叔葆等十六位詩人¹²到宋王臺暢遊聚會，賦詩填詞。陳伯陶作詩詞各二，詞後附記，講述自己輯錄《宋東莞遺民錄》之後集同人于宋王臺下祭祀秋曉先生及諸隱之靈，歎曰：“鼎湖龍去，既棄群黎；華表鶴飛，又逾千歲。問人間何世，定知今我安歸，望海上諸峰，聊作高山仰止云爾。”¹³表達了自己作爲清朝遺民的堅定信念。張學華有次韻詞《賀新郎》，下片說：“汐社風流遙倡和，尚有甕音空谷。千載後滄桑幾局。風馬雲車翩欲下，怕悲來，莫奏冬青曲。”¹⁴指出宋王臺雅集的這些文士是在遙和、效仿前代遺民。這種異代同悲在其他很多詩人筆下都有再現，如吳道鎔的“曠代生感誰期牙”，汪兆鏞的“俯仰獨悲去國賒”，何鼎元的“曠世相感情不賒”，凌鶴書的“官富場今屬誰家”，張其淦的“厓門波浪深復深，古人心印今人心”，鍾卓林的“曠代此心同耿耿”等。除當日和者之外，還有十余位詩人未及參會，也補和之，共得22位詩人38首詩7闋詞，1917年蘇澤東將其輯錄爲《宋臺秋唱》刊行。

或許是覺得詩歌描述的宋王臺還不夠具體生動，伍德彝在《宋臺秋唱》刊

11 陳伯陶：《宋皇臺懷古并序》，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卷中頁2上一頁2下。

12 蘇澤東有詩記此祭禮，詳見鄒穎文：《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續編：詩社集、詞社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4。

13 陳伯陶《賀新郎》附記，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卷上頁2上一頁2下。

14 張學華：《賀新郎》，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卷上頁3下。

行時繪《宋王臺秋唱圖》，蘇澤東首唱，作題圖詩歌《自題宋臺秋唱圖》七絕四首其後，吳道鎔、張其淦、黃映奎、梁涓、張學華等相繼有作和，而蘇澤東為答謝友人贈詩，又作《宋臺圖詠蒙海內外詞人疊賜和章賦此鳴謝》四首，並於 1922 年將這些題圖詩詞輯成《宋臺圖詠》，包含 56 位文人 193 首詩 2 闕詞。可以看出，蘇澤東是這次唱和的絕對領袖。

這兩次聚會所在之處是香港，但憂患的目光仍在大陸，體現出香港雖然劃歸英國，但骨肉血脈相連。而其中圖詠結合的表現方式是清人非常喜歡的，著名的如詞學領域的陳維崧《迦陵填詞圖》、詩歌領域的曹寅《棟亭圖》，均有大量題圖唱和作品。香港諸遺老採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固然是實際活動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未嘗不是通過對前清這種傳統的繼承來表達對故國的懷念。

（二）經歷戰亂：民族危亡與歷史情愫

如果說，民國初年的宋王臺唱和是一個高潮的話，那麼，進入二十年代，連年的戰亂，動蕩的時局，使得這種唱和進入低谷時期。此間成立的詩社雖然不少，但多存在不久就因為政治、經濟的原因被迫解散。這個時期，宋社是比較矚目的存在。宋社成員在艱險混亂的局勢中通過對宋王臺的吟唱寄託家國之思和個人不屈的意志。

1927 年，韓文舉（1864—1944）、梁廣照（1877—1951）、吳肇鐘（1887—1967）、鄭水心（1900—1975）等人結宋社，吳肇鐘說：“繼宋臺秋唱後為文酒之會，休沐餘暇，每徜徉于宋臺鶴嶺間，歌詠未有間也。”¹⁵社以“宋”名，又圍繞宋王臺開展活動，可見前清遺民設立的地標宋王臺在締結社群上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韓文舉有《題宋王臺雅集圖》：

愴傷奚止宋王臺，形跡零遺倍長哀。
只有九龍隨海逝，更無五馬渡江來。

15 吳肇鐘：《柳齋遺集序》，梁廣照：《柳齋遺集》（香港：自刊本，1962 年）。

雜心靈運從何住，醉語淵明去不回。
願學謝陶君莫笑，依依蓮社共徘徊。¹⁶

從詩題可知，此次集會尚有繪圖，惜未知存藏與否。詩人感慨，不僅僅是宋王臺，生在亂世的文人也有“愴傷”，形單影隻就像是被歷史遺留下來的“臺”，只願像謝靈運和陶淵明那樣寄情山水，如今同文友結社以求精神心靈的安頓。這種情感，韓文舉多次表露過，他說：“逸境閑尋方外友，清談又合社中人。”（《端午前一日小飲》）¹⁷“一名求舊蕭齋集，九日登高宋社場。與我飄零同地客，哀時不遇賦千章。”（《題蕭齋詩稿》）¹⁸“我心久矣著寒灰，宋社初參漸復煨。”（《宋社賓名社宴集南園》）¹⁹詩人很久以來對世事已不抱任何希望，在參加宋社之後才看到了一絲曙光。韓文舉是康有為的弟子，維新派革命家、著名的教育家，二十年代從廣州移居香港，他不抱希望的世事正是國事，他說“此生原不為溫飽，惟冀和平竊幸叨”²⁰（《由香港反廣州舟中》）、“盼來已久成虛願，照遍何時見大同”²¹（《中秋夜旅香港望月》），詩人期盼的是和平，然而，民國以還，各地軍閥割據稱雄，中華民國進入了軍閥混戰時代。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社會動蕩，經濟癱瘓。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相比較來說，香港在大罷工結束以後稍微安定一些，於是數位文人又于宋王臺畔結宋社，托古思今。

宋社另一位主要成員鄭水心，曾三度登臨宋王臺，均有詩作，他還說過這樣一段話：“海角棲遲，又淹日月，心波自蕩，時有清音，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然而山經入詠，猶紀義熙之年；天樂重開，空憶貞元之士，則其含綿繆而吐滂沛，豈得已哉！豈得已哉！”²²這種不得已，就是況周頤所說的“萬不得已之詞心”。惜宋社未見社集流傳，或許人員較少、社中人員流動，或許存在時間不

16 韓文舉著，伍學韜編：《韓樹園先生遺詩》（香港：自刊本，1948年），11頁下。

17 同上，14頁上。

18 同上，11頁下。

19 同上，12頁上。

20 同上，15頁上。

21 同上，10頁上。

22 鄭水心編：《編後小言》，《海角鐘聲》第二集（香港：自刊本，1951年）。

長。但是我們能看到，他們憂患國土國事，與陳伯陶等前清遺民的宋王臺秋唱一脈相承。

進入三十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1938年日軍侵犯廣州，多有廣東文士移家香港避亂，黃詠雱（1902—1975）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愛國殷商黃顯芝之子，並以詩詞著稱於文壇。1941年香港淪陷，黃詠雱有《淒涼犯》一詞紀事，詞前小序曰：“辛巳一九四一年。予避兵海上四年矣，辛巳十月廿四日，日本飛機侵襲九龍，投擲炸彈，予受傷。夜半，日兵闖入。炮火中，倚聲記事。用白石體。”詞中說：“足登絕島，神遊故國，霧山一髮。”詞人感慨國運殆危，又寫“角慘燈昏，倍愁我、傷鱗响沫。對哀蛩，有語欲說不敢說”。²³此詞記錄兵荒馬亂時代個人的淒涼境況，憤激之情溢於言表。但他們還是心懷希望。同年黃詠雱有詩“國恥十年誰可雪”（《辛巳秋感》），²⁴張學華也說“移山志尚存”（《八十生辰》）。²⁵和民國初年的兩次聚會不同，香港淪陷於日軍，他們直接面對戰火，其中的憂時傷國之情更甚，同時寄寓了抗戰勝利的堅定信心。

（三）戰爭之後：今昔之感與雅集之求

1945年日軍投降，香港詩社活躍，定期雅集，提倡詩詞文藝，文學風氣漸盛。碩果社、青社、風社均有以宋王臺為主題的社課，繼民國初年的宋王臺唱和之後，迎來了第二次高潮。或強調宋王臺在戰爭中的劫難，或抒發因廢墟而激起的愛國之情，或重點表達身處此地的人的感受，比如曾經的遺民、如今的遊子。

黃偉伯與友人謝焜彝、馮漸達、伍憲子於1945年5月21日組碩果社，他說：“因時局之不靖，詞客之雲散，蒞會者寥若晨星，爰以‘碩果’二字名社，非自矜也，蓋有感也。……以志香江一島，遭時喪亂，朋儕萍聚之緣”，²⁶述說了取名“碩果”的原因和結社目的。

23 黃詠雱著，黃漢清評注：《天饗詞》（香港：中國藝術出版社，2007年），頁476—477。

24 黃詠雱著，羅雨林主編：《天饗樓詩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頁277。

25 張學華：《閩齋稿》（廣州：蔚興印刷廠，1948年），頁146。

26 碩果詩社編：《碩果詩社》（第一集）（香港：復興印刷所，1947年）。

碩果社曾以《香港亂後吊宋皇臺遺址》為社課，李景康有詩曰：

壤空已證牟尼論，成往徒思輦路塵。
遺跡幾經滄海變，荒臺重歷劫灰新。
薜蘿尚厄蝦夷禍，片石難留帝子魂。
一度登臨一回首，翠華難問水之濱。²⁷

宋王臺在民國初年得到過遺民、紳商的修繕，但是在日占期間遭到破壞，幾乎淪為廢墟。詩人直指這一點，“荒臺”又一次經歷劫難。招湛銓寫：“多年不到宋皇臺，此日登臨只劫灰。磐石也隨流水去，長林空見暮鴉回。萋萋芳草生原上，寂寂斜陽照海隈。此地已忘禾黍痛，幾人憑吊志餘哀。”²⁸ 巨石被日軍炸毀，石料被運去修機場，昔日遺跡只剩劫後餘灰。詩人提醒人們勿忘亡國之痛。同樣，黃偉伯在《重登宋王臺》裏也說“舊恨已隨流水去，新愁還逐海潮來”，²⁹ 南宋王朝的歷史漸遠，而戰後國家命運之走向又不明朗。可見碩果社在戰後憑吊宋王臺遺址，就是要以戰爭期間的滄桑變幻，激蕩起身處其中文人的感慨，發揚新時代民族獨立精神。

1952年，吳天任、鄭水心等前輩的青年學子十數人結為青社，提倡詩詞，於1954年刊行《青社心聲》，其中有關宋王臺的創作也是重要內容。如陳適園《宋臺懷古二首》：“帝子荒臺舊跡存，零丁餘恨那堪論。赤灣寂寞遺民盡，楊柳蕭蕭拂墓門。”“傷心莫問南天水，滾滾東流去不回。亂石崩岩殘照裏，行人猶指宋王臺。”1954年，陳崇興、陳菊坡等創立詩書畫社“風社”，1956年以《宋王臺懷古》為詩課，如陳璿珍《宋王臺懷古》：“駐輦成陳跡，興亡恨尚存。低回憐海宇，指顧失山川。曠世心猶感，傷時淚更吞。滄桑殘石在，論古任囂喧。”³⁰ 其他詩人，或著眼于宋王臺戰爭中的劫難，“遺跡那堪留片石，古臺今已化荒邱。”³¹

27 李景康：《李景康先生詩文集》（香港：永德印務，1963年），頁24。

28 碩果詩社編：《碩果詩社》（第一集）（香港：復興印刷所，1947年），頁8。

29 黃偉伯：《負暄山館遊詩草》（香港：永發印務有限公司，1925年），頁30下。

30 風社詩畫編輯委員會：《風社詩畫集》（香港：風社，1967年），頁11。

31 同上，頁16。

(黎本立同題詩歌);或惋惜時代缺少英雄,“渡江此日多名士,失鹿中原少霸才”³²(梁藥山同題詩歌);或細細述說宋王臺在日占期間的劫難,“鼓鼙聲起震天地,香海波濤隨易幟。新圖展築飛機場,併比名山亦輕棄。炮轟斧鑿不足平,山神野鬼踉蹌驚。石坡土崩知何處,嗚咽但聞江水鳴”³³(岑季翹《吊宋皇臺》)。可見,戰後比較長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完全沉浸在喜悅之中,依然發懷古之幽思,並多了一層自身經歷戰爭的感喟。

以上三個部分體現的都是群體活動,但實際上也同時存在著很多個體的行爲,產生了大量相關作品。其中,或以不能穿越回去同前清遺民一起唱和爲憾,或對宋王臺在戰爭中“山夷臺毀”表示惋惜,或感慨宋之興亡,再三致意。如黃詠雱曾於三十年代末避居九龍,有詩《九龍宋皇臺》:“天水茫茫問水濱,景炎輦道末全湮。白鷗海上猶同死,金甲雲中倘有神。天地至今爲逆旅,江山從古有胡塵。寒風吹斷西臺淚,我亦當時慟哭人。”³⁴昔日詩老大多離世,懷念之情寓之於詩。面對古跡,追懷遺民,表達和他們一樣的“西臺慟哭”之情。民國後移居香港設帳收徒的羅濂,也曾撰《游九龍宋王臺文》,有感于“安如置幾,偃如覆舟”的宋王臺在“荒煙蔓草之區,海角畸零之地”,如今“自九龍割讓尺土,盡隸蠻天,夷人人施神工運鬼斧,夷天地菁華而莫憐,況此閱世僅存之拳石,意者亦付潮汐而化雲煙”。時移世易,懷舊之念呼之欲出,“雖故土已併幟於外族,而此山長在,實不異嶽峙而淵渟”,此臺作爲正統的象徵永遠留存在世人心中。

這些圍繞宋王臺的個體活動,孤立地看,僅僅代表他們自己,但綜合起來看,也能反映出一定的集體意識,正如陳恩維在論及南園書寫時說:“他們個人的遊憩體驗,不再是單一孤立的,而是成了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並被形塑成與特定地方有關的共同記憶。”³⁵

32 風社詩畫編輯委員會:《風社詩畫集》(香港:風社,1967年),頁37。

33 同上,頁21。

34 黃詠雱著,羅雨林主編:《天蠶樓詩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頁258。

35 陳恩維:《空間、記憶與地域詩學傳承——以廣州南園爲例》,《文學遺產》2019年第3期,頁107。

三、宋王臺詩詞唱和所展示的群體意識

社會學概念裏的群體意識(consciousness)以共同觀念的認定和實現為核心內容,伴之以歸屬感等情感。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Wright Millis)認為,群體意識的形成和存在需要具備三個條件:合理、自覺地瞭解自我的群體利益;否定或抗拒另一群體的利益;準備用集體的手段達成本群體的利益。據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群體成員有共同的觀念,清晰地認識到自己屬於某一群體,並參與本群體的交流互動,與其他群體產生區別,與個體相對的,就是群體意識。

個體文人用詩文進行表達,除了自我吟詠、抒發胸臆之外,往往還展開唱和,以之為媒介,與他人交流,進行情感與文化的互動。在關於宋王臺的各種文體中,詩歌特別是唱和詩是其中很突出的部分,遺民們的群體意識在其中凸顯,也深化了愛國主題。

我們在前面的論述中看到,從民國初年開始,以前清遺民陳伯陶、蘇澤東為中心的酬唱雅集拉開了宋王臺唱和的序幕,無論戰爭中還是戰後,關於宋王臺的唱和都在各個詩社中不斷延續,群體意識也不斷增強。

王兆鵬曾指出,“群體意識體現在群體中有權威性的作家具有領袖意識和群體成員的從服意識。”³⁶竊以為,除這兩點之外,居港遺民的群體意識還體現在群體成員主動、自發的參與意識以及彰顯、傳播本群體的意識。

首先,陳伯陶、蘇際東作為首唱者,地位突出,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他們有意識地組織唱和、邀人唱和,如蘇澤東詩題《丁巳孟春偕梁君又農重游宋王臺賦此索和》,而唱和諸人則往往在詩題中表明對主唱者極其尊重的態度,詩題中頻繁出現“敬和”“敬步原韻”等字樣。

第二,遺民們有主動、自覺參與群體活動的意識。主唱者的詩詞引起了群體間的共鳴,引發了和者“言志”的主觀能動性。丁仁長《真逸以詩索和次韻奉

36 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的詩社唱和》,《湖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頁31。

答》開篇即云：“嚶鳴相應和，千里同一聲。”³⁷和者有參與群體的主觀性，自己也要用詩歌來表達。葉寶倫的詩題就非常明確地體現了這一點：《丙辰九月十七趙秋曉先生生日，九龍真逸集諸同人致祭于宋王臺畔。時粵亂稍定，予忽忽返里，未克與會，爲之歉然。屬天寒院靜，風雨瀟瀟，舉杯陶然，素琴欲雪，意有所觸，神與之遊，中心彷徨，不能自閤，援筆秉燭，悠然賦之》，³⁸詩人因未能與“同人”共同聚會而遺憾，心有所動，不得不發之爲詩。

第三，遺民們有強烈的傳播、彰顯本群體的意識。黃慈博說：“抑第眇爲天地間集一流，而祈與月泉吟社之列乎？各存會心，靡所逆睹已。”³⁹他認爲遺民群體的唱和是心靈之記錄，能與《天地間集》、月泉吟社並列。唱和還是一種人際傳播行爲，首唱者既是創作者，又是傳播者，和唱者既是接受者，也是創作者，同時也是傳播者。他們的唱和過程是創作—傳播—接受—創作的循環往復。

他們之所以會有這樣共同的群體意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大致相同的出身。民國初年的群體多是在前清有功名或仕宦的士大夫階層文人，彼此或是同窗、友人，或是師生；其次，相似的在港處境與易代悲情。群體活動的重心更主要的不在詩藝切磋，而是交流感情。黃偉伯曾說：“蟄居香海凡十餘年，恒與朋輩唱酬爲樂，惟自天風社解散，而後雅會不常，詩聲久輟。一日謝焜彝、馮漸逵二君同過敝廬，入門即曰：‘艱困韶光，何以遣此？’余曰：‘排遣之方，莫如重結詩社。’”⁴⁰這樣的群體活動成爲他們相互慰藉的方式。

唱和群體彼此交流互動，基本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態度，主題情感也較爲一致。在這些唱和之作中，既有嚴格的步韻之作，也有非和韻之作；既有即席之作，也有追和之作，重要的是吟詠主題一致，是爲了處在充盈著情感的共生關

37 丁仁長《真逸以詩索和次韻奉答》，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卷下頁9上。

38 葉寶倫：《丙辰九月十七》，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卷上頁11上。

39 黃慈博：《宋臺秋唱序》，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序頁2下。

40 碩果詩社編：《碩果詩社》（第一集）（香港：復興印刷所，1947年），頁8。

係中，溝通思想感情。正如高嘉謙指出的：“純以遺民詩人的懷古之作看待，也許小看了《宋臺秋唱》在民初香港文學的特殊意義。它不僅表徵了南遷遺民的中原眼界和憂憤，卻同時認知了九龍地域作為避地，進而安身立命的所在。”⁴¹通過多重書寫，宋王臺成為延續中原政治的香港地標，懷念故國的主題也因之深化。

還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同樣參加唱和，作者的思想傾向也不一定完全相同，比如在民國初年的遺民唱和裏，黃瀚華固然稱讚陳伯陶和張其淦“申浦香江兩逸民”的“異代興懷”，但也感歎“除卻桃花源裏住，更無樂土可逃秦”。⁴²似乎並不認同香港為避世善地。

四、“臺”、典故與家國

居港文人選擇宋王臺為地標，詩歌中反復出現的“臺”，往往既是現實中的“宋王臺”，也暗含著典故“西臺”。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積土四方者。”歷史上非常有名的臺，比如燕昭王的“黃金臺”、西漢的“思子臺”、東漢的“雲臺”、曹操的“銅雀臺”、趙佗的“朝漢臺”、南朝的“鳳凰臺”，都往往和歷史興亡聯繫在一起。臺滿足了文人登高縱目的功能需求，又合乎中華傳統文化的尚古情結，同時還能寄託情懷。如唐人王建在《銅雀臺》所云“君不見鄴中萬事非昔時，古人不在今人悲”，其中就有歷史滄桑，今昔之感。

《宋臺秋唱》中，“西臺”體現出明顯的歷史傳承和象徵性。西臺亦稱釣臺，在今浙江桐廬富春山，相傳為東漢隱士嚴子陵垂釣之處。南宋謝翱成立汐社，取“潮水有信”意，表達興復故國的信心，又登西臺為抗擊元軍犧牲的文天祥而痛哭。這兩件事，正和當時諸遺民的心態相吻合，因此“西臺”“汐社”在關於宋

41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頁324。

42 黃瀚華：《祀秋曉先生生日……時真逸瓜廬初成》，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卷上頁10下一頁11上。

王臺的吟唱中得到的反響也最多。如黃慈博在《宋臺秋唱》序言裏就直接說到“謝皋羽之西臺”，還有諸如“南野西臺慟哭處”（陳伯陶），“我亦當年謝皋羽，西臺慟哭只編詩”（賴際熙），“同抱謝翱才”（蘇澤東），“汐社風流遙倡和”（張學華），“迎汐社”（丁仁長），“汐社名傳”（張其淦）“今無汐社人”（沈澤棠）……居港遺民在宋王臺雅集，與謝翱登西臺慟哭事，一為遜清遺民，一為南宋遺民；一是宋代留下的宋王臺，一是東漢嚴子陵之臺，相同的遺民身分，都是登“臺”，體現出共同的這文化傳承。吳道鎔在《宋臺秋唱》序言裏說：“其視杜伯原之《穀音》，謝晞發之《天地間集》，吳清翁之月泉吟社，托旨略殊，體亦差別，然而性情所得，未能忘言。”⁴³把這次雅集同歷史上三位著名的遺民，謝翱、吳渭和杜伯原所作相比。其中，吳渭創立“月泉吟社”，以大型的社集活動，傳達故國之思；杜伯原輯宋末遺民詩結集為《谷音》；謝翱創立汐社，並輯錄宋末故臣遺老之詩為《天地間集》，並與其友人登西臺祭文天祥，作《登西臺慟哭記》。這三者共同構成了“宋臺秋唱”的底色。

當然，詩歌亦運用其他典故，以形成不斷疊加的意象，傳遞隱喻，如“崖山”、“菜羹茅屋”、“冬青”等，都可與“西臺”相互補充。

崖山海戰是南宋末年滅亡之前的最後一次戰役，陸秀夫背負帝昺跳海自盡，宣告了宋朝的徹底覆亡，因此，崖山之典作為沉重的記憶，在唱和之作中頻頻出現：“崖山風雨歸途賒”（陳伯陶），“重雲黯黹崖門遐”（吳道鎔），“溯當年崖山風雨”（張學華），“崖門風雨攜蠹牙”（汪兆鏞），“惆悵崖門”（黃衍昌），“崖門崩浪摧鯨牙”（趙九疇），“靈旗長繞崖山雲”（丁仁長），“崖門波浪深複深”（張其淦），“淚盡崖門水（何藻翔）”，“河山悲故國，風雨泣崖門”（沈澤棠），“慟哭激海濤，聲答崖山響”（黃映奎），“信國是依，崖山之陽”（葉寶倫），“崖門瞻望涕淚新”（鍾卓林），“心戀崖門闕”（蘇澤東）。這些詩中，或寫崖山的風雨之烈，或寫崖山的戰事之酷，或寫崖山海戰造成的心靈激蕩之深，都能夠看出古今對照時引起的強烈刺激。

“菜羹茅屋”出自南宋遺民趙秋曉的《隱居》詩：“詩人只合住茅屋，天下未

43 吳道鎔：《宋臺秋唱序》，蘇澤東：《宋臺秋唱》，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序頁1下。

嘗無菜羹”。廣東東莞人趙秋曉是陳伯陶在祭祀活動中樹立的忠義典範，引起了遺民們巨大的心靈共鳴：“記詩人，海邦偕隱，菜羹茅屋”（陳伯陶），“歎當年，回日雄心，換來茅屋”（吳道鎔），“菜羹茅屋何為家”（汪兆鏞），“算只合菜羹果腹”（黃佛頤），“菜羹茅屋幸不乏”（丁仁長），“菜羹茅屋有斯人”（張其淦），“詩人茅屋化歸鶴”（張其淦），“菜羹行處有”（何藻翔），“襟懷茅屋貴，風味菜羹清”（沈澤棠），“茅屋茹菜羹，貧賤多悒快”（黃映奎），“茅屋可居，菜羹可嘗”（葉寶倫），“菜羹薦饌思初度”（趙允鏐），“茅屋祀詩人”（蘇澤東）“菜羹只合薦王孫”（蘇澤東）。這些遺民從廣東來到香港，不少人放棄了原來優渥的待遇，在這裏過著相對貧困的生活，因此，對趙秋曉的事蹟心有戚戚焉，趙是廣東人，他們以之為榜樣，更有息息相通之感。

“冬青”之典出自明代陶宗儀《輟耕錄》，當時元朝的江南佛教總管楊璉真迦挖掘南宋六陵，義士唐珏收集南宋諸帝遺骨掩埋，並移植宋故宮冬青樹作為標記。謝翱感其事，為作《冬青樹引》。冬青具有了緬懷舊朝遺事的象徵意義，於是也頻頻被提及：“冬青樹老寒蕪綠”（陳伯陶），“怕悲來，莫奏冬青曲”（張學華），“君不見，冬青樹下鶉啼哀”（張其淦），“誰訪冬青記”（蘇澤東）。詩人們借“冬青”這個中原風物寫心理之景，將傳統的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符號移植到嶺南，形成文化記憶。一般而言，眼前自然之景為實，想象之景為虛，然而這裏詩人們吟詠的冬青則處於虛實之間，一方面超出視線範圍，另一方面又很可能是詩人曾經所觀察到的自然景物，既有直觀的美感，又有想象的空間，並且還有人的行為和感受因素。

五、個體、傳承與文化記憶

以上可以看出，文人們通過關於宋王臺的各體書寫，構建起飽含文化記憶和自我經驗的心靈世界，體現出文化的連續性和恒久性。德國歷史學家揚·艾斯曼（Jan Assmann）將集體記憶作為上位概念提出和交往記憶並列的文化記憶，認為“文化記憶關注的是過去中的某些焦點。即使是在文化記憶中，過去也不能被依原樣全盤保留，過去在這裏通常是被凝結成了一些可供回憶附著

的象徵物”。⁴⁴ 在這個意義上，宋王臺也堪稱此類象徵物，體現出特定的時空關聯。

另外，宋王臺的書寫是一種動態的傳承和接受，既體現出對過往的記憶，又活在後人的記憶中。民國初年，以前清遺民為代表的文人多緬懷前代（特別是南宋），民國後期的文人亦回憶前清遺民。黃詠雱在五十年代寫下了懷念吳道鎔、陳伯陶、張學華等前輩的《感懷詩》，有曰：“玉性松心潔，螭頭龍尾尊。瓜廬高隱宅，天水二王村。野史遺民淚，春風望帝魂。宋臺翹首處，朱鳥怨黃昏。”⁴⁵ 寫陳伯陶縱然隱逸，卻從未忘懷故國。詹安泰《游宋王臺》有這樣的句子：“摩挲勝跡憐頑石，多少行人托苦吟！帝子精魂隨日遠，孤臣痛淚剩波深。”⁴⁶ 逝者已矣，而讓憑吊者傷心苦吟的勝跡依然留存，登臨宋王臺的詩人在這樣的文化傳承中，永不泯滅的，是心向華夏的情懷。

宋王臺在民國初年從實體名勝進入文學書寫，前清遺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時的人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梁涇《宋臺秋唱跋》有言：“蘇君選樓，客遊到此，究心古跡，遍搜諸家近作，凡涉宋事暨居九龍留題唱和之詩，輯成斯集；而古官富場之舊聞新詠，乃流播人間，名跡始不終秘。豈山川之顯晦有時，抑如潮惠之學術文風，必俟昌黎東坡提倡，海濱鄒魯漸臻于盛乎？地以人傳，於茲益信。”⁴⁷ 蘇澤東也發過同樣的感慨：“而地以人傳，輒欲附驥，垂不朽耳。”⁴⁸ 一致認為文學的傳播非常重要。從後來黃詠雱、詹安泰的詩歌來看，蘇澤東等人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是成功的，他們的創作增強了歷史的記憶。

民國後期的宋王臺書寫，既包括對前人的書寫傳承，還包括對時代變遷中歷史的再現，以及記錄個體的生命體驗。劉士瑩的《沁園春》有序曰：“往嘗登宋皇臺憑吊，不勝歔歔，顧未有所作。今則數仞已平，但余片石。向之所謂臺者，從此置諸虛無想象之間。回首陳跡，感慨何極！因追為此解，

44 揚·艾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6。

45 黃詠雱著，羅雨林主編：《天蠶樓詩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頁228。

46 楊偉群：《嶺南當代詩詞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18。

47 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年)，頁234。

48 同上，頁234。

聊以寄懷云。”⁴⁹文人的再現記憶就等於再生產，會有選擇地重塑過去，以服務自身的情感和認同需要。

從前瞻性的角度來看，文人們在書寫地標的時候，注重的是功績名望，以及對獲取不朽聲譽的追求。從回溯性的角度看，地標書寫的重點是傳播，使之被銘記於心。我們可以看到，文人們對於宋王臺的書寫既帶有濃厚的個人和時代的色彩，又與集體和傳統相連，構成了一條不斷延伸的文學記憶鏈。宋王臺在一種特殊的時空中直接或間接地進入了諸多個體的記憶之中，而這種記憶是在個體與其他人交往中，並且是在社會的框架裏形成的，經過時間的洗禮，這些集體記憶最終轉換為文化記憶。

總之，民國初年遺民們選擇宋王臺作為心靈的寄託，抒發思念故國之情的同時以堅守中華傳統文化，守護文化精神為己任。抗戰時期，面對國家和個人危難，文學成為凝聚民族團結的力量。無論時代如何，文人們的家國情懷始終如一。“臺”承載著歷史記憶，以“西臺”吟詠宋王臺體現出文化傳承。宋王臺借助文學作品得到沉澱，成為地標。而在文化傳承過程中，又體現出文人個體確立適時身分的需求，在文化的深厚時間裏尋找自我的社會定位。如此一來，宋王臺也就發揮了在個體、社會和文化三個維度的作用，在文學史上具有了深遠的意義。

(作者：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廣西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桂學研究院研究員)

49 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年)，頁260。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黃偉伯著：《負暄山館遊詩草》。香港：永發印務有限公司，1925年。
- 陳伯陶著：《瓜廬文牘》。香港：鉛印本，1931年。
- 碩果詩社編：《碩果詩社》（第一集）。香港：復興印刷所，1947年。
- 張學華著：《闇齋稿》。廣州：蔚興印刷廠，1948年。
- 韓文學著，伍學韜編：《韓樹園先生遺詩》。香港：自刊本，1948年。
- 鄭水心編：《海角鐘聲》（第二集）。香港：自刊本，1951年。
- 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香港趙族宗親總會，1960年。
- 梁廣照著：《柳齋遺集》。香港：自刊本，1962年。
- 李景康著：《李景康先生詩文集》。香港：永德印務，1963年。
- 風社詩畫編輯委員會：《風社詩畫集》。香港：風社，1967年。
- 潘小磐等輯：《蘇澤東〈宋臺秋唱〉、陳步墀〈宋臺集〉》。香港：自刊復印本，1979年。
- 楊偉群：《嶺南當代詩詞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
- 黃詠雱著，羅雨林主編：《天蠻樓詩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 黃詠雱著，黃漢清評注：《天蠻詞》。香港：中國藝術出版社，2007年。
- 程中山主編：《香港文學大系 舊體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 揚·艾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高嘉謙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 鄒穎文編：《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續編：詩社集、詞社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

二、論文

- 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的詩社唱和》，《湖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頁29—33。
- 陳恩維：《空間、記憶與地域詩學傳承——以廣州南園為例》，《文學遺產》2019年第3期，頁105—117。

Landmark, Memory and Homeland

—On the literary writing of Sung Wong Toi (1911 – 1960)

Wang Juan

(Professor,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ung Wong Toi, located in the Kowloon area of Hong Kong, is where Emperor Shi and Emperor Bing, the last two emperors of Southern Song, escaped for a short time at the end of the dynasty. This historical site has not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for hundreds of years. The terrace has long disappeared, leaving only a giant stone with the three characters "Sung Wong Toi" written on it. When the Qing loyalists, represented by former Imperial Academician Chen Botao, emigrated to Hong Kong around 1911, they researched and wrote poetry about Sung Wong Toi, making it a symbolic landmark for the Qing loyalists in Hong Kong to commemorate the former dynasty and their homelan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fterward, literati living in Hong Kong accepted and inherited the memories of the Qing loyalists, wrote poems around Sung Wong Toi,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During the war, they carried forward the spirit of national unity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peril, and after the war, they expressed nostalgia and emotional response to the turmoil. Poems about Sung Wong Toi written by Qing loyalists residing in Hong Kong reflect the group'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cluding Chen Botao and Su Jidong's sense of leadership, the members' obedience, and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ir group. Their use of classical images such as "Yashan," "Cai Soup Thatched House," "West Terrace," "Xi She" and "holly" in their poetry reflects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symbolism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f

Guangdong. The literati constructed a spiritual world full of cultural memory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rough the writing of Sung Wong Toi. Sung Wong Toi carries the patriotism of several generations.

Keywords: Hong Kong, Sung Wong Toi, group consciousness, homeland, cultural memory